

#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编

GONGGONG JINGJI YU GONGGONG ZHENGCE

2017年 第1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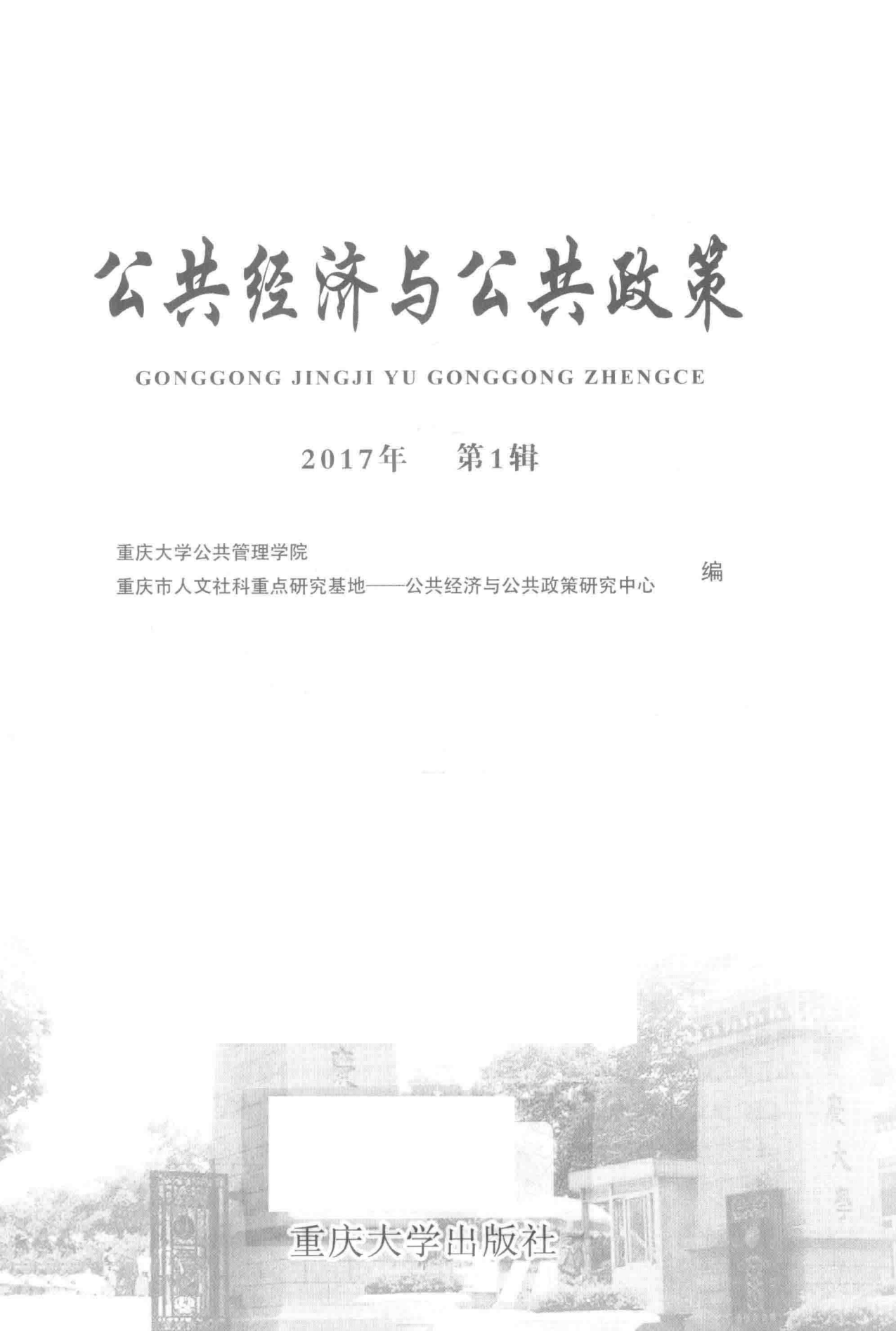
GONGGONG JINGJI YU GONGGONG ZHENGCE

2017年 第1辑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689-0869-6

I. ①公… II. ①重…②重… III. ①公共经济学—研究②公共政策—研究 IV. ①F062.6②D03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7843号

##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2017年第1辑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  
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尚东亮 版式设计: 尚东亮  
责任校对: 贾梅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08千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869-6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同步发展

（代序）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的不断更替的体制看成是在试错中寻找合适的组织模式，那么，可以认为没有哪一个时期，也没有哪一个社会像中国社会这样，在 100 年的时间里承载过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实验。

任何试错式的实验都有社会成本。在过去的 100 年里，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我们经历过抵御侵略的战争，也经历过为了寻找实验目标的内战，包括在战争结束之后寻求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体制而发生的争论，甚至让不少仁人志士为之付出了宝贵生命。

幸运的是，中国的社会实验带来更多的收益，尤其是过去的 40 年，我们在经济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社会上经历了从单位向社会的回归；经济与社会在历史互动中不断迭代，正在形塑一种未曾出现的关系模式，即人们常说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让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人口大国发展为一个经济总量的大国，也正在让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强国。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正在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模式，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发展理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曾经付出的代价能让后来者引以为戒，中国获得的经验能惠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有效地归纳和总结中国社会实验的经验教训就是中国学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常愿意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辑刊看作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仁为社会尽责的一种尝试。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12年初正式挂牌，顺应了中国改革实践的需求。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公共政策的形态体现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服务的公共产品。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均等化，环境保护的倡导和制度建设的努力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在宏观制度的引领下形成了各地因地制宜的公共政策。我们知道，公共政策虽然是从社会公平出发的，也绝不意味着不计成本，探讨公共政策效率是中国社会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刚性需求。公共管理学院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需求，在从过去的贸易与行政学院转型为公共管理学院的过程中，采用扬长避短的方式在公共管理学科中搜寻适宜的生态位，把学院的学科建设定位为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优势探讨公共管理领域的基础议题和前沿议题，形成了“公共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也是辑刊题名的由来。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学科的建设又何尝不是诸多同仁长期努力和积累的后果。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虽然在应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各有深厚的积累，可是，集两者之优势的融合并不等于把两者进行简单相加，它需要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的教授、讲师们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地、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交锋。为了给学院教师提供沟通的机会，学院设置了“湖畔沙龙”，在学期中两周一次，任何议题、任何形式都可以，焦点是学术。经过几年的努力，沙龙开展了几十次，共识越来越多。

为更好地建立共识，不仅在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在学术界，我们编辑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辑刊，一方面向学界汇报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同仁的努力；另一方面，把学术领域基础和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带回到学科建设之中，意在促进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不仅仅是重庆大学的。

万事开头难。第一辑的编辑总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寄托放之其上，既希望有一个好的起点，又希望惠及学院同仁；既希望向学界汇报，又希望带回学界的基础和前沿的理论与方法；最直接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中国学术评价体制的阻碍，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辑刊不能带给作者应有的回报，因为它上面的发表既不被科研考核制度计算科研成果，也不被工作考核体制计算工作量。尽管如此，在学院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第一辑终于成稿了。

这一辑，我们把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畔沙龙”的部分内容摘要，另一部分是学术论文。目的是尽量反映在有阻碍的前提下，学院师生的努力。作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新嫁娘，无论美丑，我们都希望它得到学术界的接纳、批评和鼓励。

这一辑论文的汇集得到了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生的积极响应，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仁和刘渝琳教授为组稿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编辑和出版得到了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凝聚了编辑和出版社同仁的心力。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的改革实践还在进行中，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任重道远，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您的支持和鼓励下，使《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能成长为一本有志同仁的案头辑刊。为此，我们将砥砺前行，不负众望。

邱泽奇

2017年8月

## 目 录

### 湖畔沙龙部分

- 2 /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产领域持续通缩的成因分析
- 5 /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命令控制还是经济激励？
- 8 / 我国资本存量核算的若干问题探讨
- 10 / 从社区心理学视角促进积极老龄化
- 13 / 大学专业与职业发展异质性研究

### 学术论文部分

- 16 / 公共经济学发展与现状：文献综述 / 丁从明，吴羽佳
- 39 /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路径演变与创新 / 何跃，张科，梁丹丹
- 50 / 中国制造业技能人才稳定性特征及相关政策建议 / 李志，朱欣灵，  
贺菲
- 64 / 复杂“粘着”：构建太湖治污效果存续的新框架 / 罗章，凌剑峰
- 77 /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资本投资效率研究 / 蒲艳萍，成肖
- 99 / 公共管理中的真实型领导：理论建构及其运用 / 谢征，赵泽洪，毛丹
- 111 / 委托代理视角下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与机制分析——以大巴  
山区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实践过程为例 / 钟兴菊
- 126 / 城市社会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 张礼建，  
向礼晖
- 134 / 功能偏好视角：城郊农村与远郊农村土地流转的比较差异与策略 /  
张鹏，王沛奇
- 149 / 信息壁垒与信任危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与预防——基于嵌  
入性视角 / 彭小兵，陈艺洁
- 161 / 重庆、成都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 / 刘燕，陈超霞，卓苗苗
- 174 / 人口发展、内生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效应 / 刘渝琳，伍瑜
- 192 /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政府规制研究——基于服务型政府视  
角 / 张邦辉

---

# 湖畔沙龙部分

HUPAN SHALONG BUFEN

---



#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产领域持续通缩的成因分析

**按语：**学术沙龙第 25 期。学院公共经济系等系科教学科研骨干于 2016 年 4 月 7 日 12:50—14:30 在公共管理学院 1 楼湖畔咖啡厅参与“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产领域持续通缩的成因分析”的学术报告活动。

2012 年 2 月以来，我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呈现出了连续下降的趋势，PPI 同比增长速度表现出了长达 50 多个月持续为负的罕见状况，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领域价格（PPI）所出现的历时最长的通缩。而在 PPI 持续低迷的态势下，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处于低位，并重返“1 时代”，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我国未来出现消费领域通货紧缩可能性的担忧。因为，PPI 的持续低迷可能会形成价格领域的通缩预期，导致 PPI 水平的继续下跌循环并向消费领域传导，从而造成生产领域价格水平的持续低迷，并拉动 CPI 同比增速下降，引发消费领域通缩的担忧。而且，PPI 的持续下降可能会使得企业产品库存增加和利润下降，从而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并使得经济收缩。因此，现阶段 PPI 的持续低迷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那么，造成此次 PPI 长时间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与以往两次相比有何异同？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手段来应对 PPI 的持续低迷？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理论分析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投资和货币供给下跌三种因素对 PPI 低迷的影响在逻辑上都是比较清晰的，而且还可能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将三种因素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模型中进行对比分析，以对比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而且，随着经济环境和背景的变化，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可能是时变的，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各因素在不同时刻对 PPI 影响的强度不一致。事实上，在经济新常态下，本次 PPI 低迷的持续时间比前两次明显要长，这有可能是各因素的影响强度出现变化所造成的。也就是说，造成 PPI 变动的三大因素的重要性可能是时变的，为此，我们

采用新近发展的带有随机波动项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TVP-VAR-SV, Time-Varying Parameter VAR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来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投资以及货币供给对我国 21 世纪以来的三次 PPI 低迷的不同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是 PPI 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从成本加成和企业利润的角度来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的成本下降导致的生产供给曲线右下方移动对企业的利润损害有限,只要出厂价格 PPI 下降幅度小于大宗商品的下降幅度。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所形成的扩张效应导致的“通缩”,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失业率下降。而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的两者 (PPI-CRB) 之差大于 0,说明大宗商品下降对 PPI 的下降并未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危害。2014 年 4 月以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和 PPI 的进一步下探,两者 (PPI-CRB) 值开始小于 0,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企业利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在目前适当加大投资以提升需求和使得 PPI 上涨,对于保证企业利润和经济信心和稳定增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投资增速对于 PPI 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是因为存在如下原因:一方面,投资的增加会拉动对工业品中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 PPI 的上涨;另一方面投资的增加却会增加生产能力,形成产能过剩,对 PPI 有压制作用。因此,投资的增加对于 PPI 的作用的方向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大小。投资增速下降对 2012 年以来的 PPI 下降也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的需求下降对我国的 PPI 下降效果比较明显,国家对投资增速的控制效果比较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投资增速有较大的增加导致的产能过剩会对 PPI 的下降有较大的效果。

再次,货币供给增速对于 PPI 的影响一直是正向作用,但对现阶段 (2012 年 3 月至今) 的影响强度相比区间 1 要小。自 2012 年以来,国家拧紧了货币供应的水龙头,货币供给增速呈现出了明显下降趋势,但货币供给增速对 PPI 的影响强度仍然较大。货币供给的收紧对于 2012 年以来的 PPI 下降作用也是比较明显,一方面,货币供应的增速的下降抑制了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所有商品上涨;另一方面,货币增速下降控制了总需求的增加,从而控制了对工业品的需求。

最后,在我国农产品供需紧平衡和服务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涨对食品和服务价格的传导是 CPI 上涨的重要原因;工业产能过剩背景下,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下挫对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是 PPI 下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一涨一跌”使得 CPI 与 PPI 变动“正负背离”，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是 CPI 与 PPI 之间缺口扩大接近于历史最大水平的主要原因。在目前我国 PPI 仍然处于低迷的状况下，并基于上述研究和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抓住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低迷时机，实施大宗商品储备战略计划。第二，在供给侧保证投资结构优化的情况下，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速是必需的，既防止了产能过剩又对经济稳定和 PPI 转正有积极的影响。第三，需要继续实施结构化的货币政策，以适当增加的货币供给增速来配合投资以增加需求和刺激 PPI 的回暖。发挥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定向调控的作用，盘活资金存量，引导资金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支持短缺供给行业的发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通缩风险。

执笔人：龙少波

##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 命令控制还是经济激励？

**按语：**学术沙龙第 32 期。学院公共管理系等系科教学科研骨干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 12:50—14:30 在公共管理学院 1 楼湖畔咖啡厅积极开展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命令控制还是经济激励？”的报告活动。

当前，中国面临大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国家已出台多种政策措施进行应对，然而传统的单一污染物治理模式在减排局地大气污染物及控制温室气体方面存在互斥效应。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造成资源浪费，降低治理效率，减弱政策效果。这种互斥效应在微观企业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需要结合技术手段和企业的成本效益，综合考察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益，创新治理模式。本质上，大气污染物如  $\text{SO}_2$ 、 $\text{NO}_x$  和颗粒物等与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多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具有“同源性”，从而为协同控制提供了可能。那么，针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政策能否成为成本有效的、合理的政策选择？进一步，应如何选取和优化协同控制政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尝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选取重点高污染行业，量化评估并比较分析“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这两类政策手段对于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果、成本及潜力等。

本文的综合评价模型由自上而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和自下而上的 CIMS 技术模型通过单向软连接构成。该综合模型可以模拟分析协同控制政策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能源需求和污染排放等的影响。其中，CGE 子模型是基于中国 2012 年社会核算矩阵构建的单区域、递归动态模型，包含了 60 个生产部门或商品。模型采取多层嵌套的 CES-Leontief 生产结构，采用 Cobb-Douglas 效用函数，采取大国假设，并允许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内各部门间的自由流动。CGE 子模型基于通用代数建模系统（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 GAMS）运行，负责经济系统的模拟，

主要输出经济变量如 GDP、部门产值和能源价格等的变动。

文献回顾发现,当前文献对技术竞争、市场份额变化、能源替代的动态渐变过程关注不足,并难以深入到行业、技术、重点产品层面。由于研究深度不足,对重点行业和部门影响的认识尚浅,关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控制应当如何协同以及实施路线应当如何设计均无定论,客观上妨碍了出台协同控制政策。近年来,国际上对于“自下而上(bottom-up)”,基于行业和部门技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简称 3E)综合模拟模型日益重视。CIMS 模型作为一种国际领先的 3E 综合模拟模型,将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用以深入分析电力、钢铁、化工、水泥、交通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果。本文收集能源供给、能源消费、能源价格,重点行业生产技术、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污染物排放系数,重点行业技术资本成本、运行维护成本、能源消耗成本、能源效率、能源类型、投入使用初始年份、使用期限等数据,建立服务于 CIMS-China 模型的 3E 数据库。通过敏感性分析、统计回归分析等手段,调整 CIMS 模型的关键参数,在 3E 数据库支持下,构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CIMS-China 模型,并开展模拟分析。

本文的 CIMS-China 模型关注电力、钢铁、化工、水泥、交通等 5 大重点行业,模拟共计 154 项生产技术的竞争和替代过程。对每一项政策情景而言,由 CGE 子模型得到各部门生产规模和能源价格的变动,并输入 CIMS 子模型完成综合影响评价。本文的 CIMS 子模型主要输出技术演进、能源消费、大气污染排放( $\text{SO}_2$ ,  $\text{NO}_x$ , PM)、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text{CO}_2$ )等的变动情况。

在政策选择上,本文选取“经济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这两类政策手段作为量化评估和比较分析的对象。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要求,为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部、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在研究、吸收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201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因此,选取环境保护税(包括碳税)作为“经济激励型”政策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选择  $\text{SO}_2$ ,  $\text{NO}_x$ , PM 三项应税污染物,并依据不同污染物及不同的税收额度,设定 6

个环境保护税政策情景。此外，本文还设计了 2 个碳税政策情景。在“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的选取上，本文以末端治理（EOP）措施为代表。依据 EOP 措施不同的安装使用率，针对多个行业、多种污染治理（ $\text{SO}_2$ ， $\text{NO}_x$ ，PM）共设计出 12 个政策情景。进而，通过综合评价模型，模拟分析以上所有“经济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政策手段的协同减排效果，并开展成本效益分析。

基于环境成本和经济福利的初步研究发现，尽管 EOP 措施能够明显减排  $\text{SO}_2$ ， $\text{NO}_x$  和 PM，但会增排  $\text{CO}_2$ ，其对于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互斥效应明显；而以环境税（包括碳税）为代表的经济激励手段则在绿色税制改革框架下，具有明显的协同减排效应，且成本有效，能够取得经济与环境双重红利。研究认为：“经济激励型”政策手段要与技术手段相结合、相匹配；当前环境保护税法（草案）中  $\text{SO}_2$ ， $\text{NO}_x$  和 PM 等的税率偏低，并不足以保证长期取得良好的协同减排效果。未来，中国应在推动绿色税收体制改革的框架下，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应在统一税率的基底上，通过下放环境价格定价权，体现出区域差异和地方弹性。当然，以上研究结论的合理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更多的“政策试验”。通过模型的扩展，分析排污权交易 / 碳交易的协同控制效果是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

执笔人：宋鹏

## 我国资本存量核算的若干问题探讨

**按语：**学术沙龙第35期。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曹跃群教授于2016年12月8日12:50—14:30在公共管理学院1楼湖畔咖啡厅开展了“我国资本存量核算的若干问题探讨”的报告活动。

资本作为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资本存量是开展各种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是开展资产负债核算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它和生产账户、收入形成账户等一起构成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有机整体。国际上关于资本存量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已日趋成熟，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建立起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和估计的统计方法与制度，并定期发布各种关于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资本存量核算方面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有关资本存量概念理论内涵的界定、计算范围与口径、估算的具体方法、所利用的统计资料等方面都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尚缺乏一套系统的关于我国资本存量核算的制度、数据库和方法库。那么，如何填补我国在资本存量研究分析中这些方面的不足，所面临的重难点问题有哪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又如何？从总体框架上看，重难点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本理论与方法方面，包括：①资本存量核算基本概念与基本指标的研究。资本存量是由几个互相联系、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组成的多层次的范畴体系，近年来联合国制定的SNA2008进一步扩大了固定资本形成的概念，将研发支出等也列为投资。为适应这一变化，关于资本流量和存量的统一口径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根据新的变化理清有关资本存量指标的概念，给出清晰的理论内涵与明确的统计外延，并且进一步明确各相关指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②资本存量核算的价格问题。不同固定资产的实物形态不同，必须借助于价格才能汇总计算资本存量，其

核算价格涉及现价、不变价和历史价格。由于各种原因,以往国内外学者对资本存量估算的价格问题研究不足,特别是对资本存量价格指数的问题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必要考虑构建资本存量的价格指数,以及如何利用不同的价格指数进行资本存量之间的换算问题。③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以往我国学者主要探讨了永续盘存法,从国际上看,尽管永续盘存法属于主流方法,但实践中采用的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包括直接调查法、基准年份盘存法和永续盘存法三类,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资本存量。为了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本存量核算方法的具体方案,有必要对这些方法的利弊及其适用的前提条件进行分析。④对各国资本存量核算实践的考察。由于各国的国情有别统计基础不一样,其所实施的资本存量核算方法与制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资本存量核算实践进行考察,从而为构建我国资本存量核算方法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是应用研究方面的重难点主要在于:如何将获得的资本存量数据用于经济分析和预测,使之能更好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应用:①利用资本存量数据测算资本系数和资本回报率。这两个指标是开展宏观经济分析需要的重要指标,通过横纵向对比可以分析我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水平与变动趋势。②利用资本存量数据建立经济增长计量模型。该模型允许资本、劳动力要素及经济增长之间有更灵活的关系,并考虑用非参数及半参数的方法对资本存量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做更灵活深入的探讨。③利用资本存量数据建立可用于分析资源配置效应影响的经济计量模型。该模型可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分解为5部分,可以为经济预测、宏观经济调控和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必要的数量依据。

理论方法研究为基础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我国资本存量核算方法与制度的构想,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基础统计研究则为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在取得关于资本存量的数据之后,一方面可以开展各种应用研究,另一方面可以进行数据库的建设。

执笔人:曹跃群



## 从社区心理学视角促进积极老龄化

**按语：**学术沙龙第36期。学院公共管理系等系科教学科研骨干于2016年12月29日12:50—14:30在公共管理学院1楼湖畔咖啡厅积极开展了“从社区心理学视角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报告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持续提高。到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数量。目前全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为8.41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0亿。这些老年人中的80%将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Mathers et al., 2015）。中国目前面临老龄化的巨大挑战，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50的40岁增长到2010的70岁，并且这种增长趋势一直持续（Smith, Strauss, & Zhao, 2014）。到2016年，中国有2.3086亿老年人（年龄大于60岁），占中国总人口的16.7%，而且中国的老龄化增速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加剧不仅影响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且给家庭、政府和社会增加负担，阻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1990年，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老龄化”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提出“积极老龄化”发展战略，在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老龄群体，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在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潜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人类发展的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el）强调，个体是嵌套于家庭、社区、城市、国家等各个不同层级的社会系统中，这些系统由近及远层层嵌套，均会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传统的心理学研究非常关注老年人自身的因素（如收入水平、认知风格、应对方式、人格特点等）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而忽视社会环境的作用。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是除个体和家庭因素之外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系统。而且相比于个体和家庭因素，研究社区因素有助于从社区层面对老年人生活质量进